

## 杜維明對陽明心學教育觀的吸取與應用

黃文樹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特聘教授

### 摘要

杜維明是第三代當代新儒家的健將，被譽為「儒家文化的布道者」、「海外推展新儒學最力的一人」。他自少年起即接觸陽明詩文，青年時期得力於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第二代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牖迪，漸入陽明心學之境。1968年，以《青年王陽明》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1981年起任哈佛大學教授，1988年成為美國人文、藝術及科學院院士，以發揚、傳佈儒學為畢生志業。他大量吸取陽明心學精華，在教學、講學與著作中充分應用了陽明心學教育觀，倡導「社會良心」、「士的自覺」、「體知」、「習明納」、「修身與身教」、「靈性培養」，強調儒家倫理價值，以及鼓吹「傳道精神」等理念與作法，在當代高教杏壇放一異彩。

關鍵詞：杜維明、陽明心學、教育觀、第三代當代新儒家



# **The Capture and Application of Yang-ming's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by Tu Wei-Ming**

**Huang, Wen-Shu**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College of Liberal Education  
Shu-Te University

## **Abstract**

Tu Wei-Ming is a master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 and is recognized as a “preacher of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hardest worker promoting neo-Confucianism abroad.” Starting with the study of Yang-Ming’s poetry in his youth, he was inspired by second-generation neo-Confucianism representatives like Hsu Fu-Guang, Tang Jun-Yi, and Mo Zong-San to gradually comprehend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In 1968, he received a doctoral degree of philosophy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with “Wang, Yang-Ming’s Youth.” Then, he delivered lectures at such renowned institutions as 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Berkeley University. He has served as a Harvard University professor since 1981 and has become an academician of US literature, art, and science to elaborate and preach Confucianism as his life aspiration. He significantly engages in the essence of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mind and thoroughly applies Yang-Ming’s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in his teaching, lectures, and writing. Meanwhile, the ideas and measures of promoting “social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of a scholar”, “comprehension”, “seminar”, “moral cultivation and teach by own example”, “spirituality nourish”, stressing the ethical value of Confucianism and advocating for “the spirit of an evangelist” have all allowed him to yield particularly brilliant results in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Tu Wei-Mi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Third Generation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



## 一、前言

回溯有明一代，在中葉之前，朱熹（1130-1200）理學獨霸天下，被奉為圭臬，所謂「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sup>1</sup>不過，到了正德、嘉靖之際，王陽明（1472-1528）「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sup>2</sup>；「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他所高張的「心學」旗幟，以新穎性、突破性滿足了士人渴望新思想的需求，學術風氣為之一變：「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sup>3</sup>

王陽明作為明代中期思想家兼教育家，為了弘揚儒家德治傳統，救治明王朝政治、社會與道德危機，他在繼承孔子思想和開拓孟子、陸象山（1139-1193）心學傳統的教育理念之基礎上，通過自己曲折的學術探索及講學實踐，逐步醞釀、型塑了自己的心學教育觀。其心學，可概括為三：一是主張「心即理」，強調心是天地萬物之主，「心外無物」，「心外無理」。二是倡導「知行合一」說，謂「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sup>4</sup>三是提出「致良知」為鵠的。他明確指出：「良知者心之本體」<sup>5</sup>；「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sup>6</sup>，籲請人們「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sup>7</sup>。

陽明的心學教育觀，以「良知」為基礎，以「致良知」為核心。他用孟子的「良知」這一概念來表達「心」，指出「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sup>8</sup>；「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sup>9</sup>。認為「良知」不僅

<sup>1</sup>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河洛圖書出版公司，1974年），卷10〈姚江學案〉，頁53。

<sup>2</sup> 清·顧炎武著，周蘇平、陳國慶點注，《日知錄》（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7年），卷18〈朱子晚年定論〉，頁824—825。

<sup>3</sup>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卷282〈儒林傳序〉，頁2。

<sup>4</sup>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2〈傳習錄中〉，頁42。

<sup>5</sup>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2〈傳習錄中〉，頁61。

<sup>6</sup>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2〈傳習錄中〉，頁45。

<sup>7</sup>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2〈傳習錄中〉，頁83。

<sup>8</sup>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2〈傳習錄中〉，頁47。

<sup>9</sup>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2〈傳習錄下〉，頁104。



是天地萬物的根源，而且也是道德觀念的來源和本身。他講的良知、心，主要包括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節、廉、恥等德目。此外，陽明還把「良知」視為辨別是非、善惡的標準。他說：

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sup>10</sup>

也就是說，自己的意念、思維等認識上的正確與錯誤，道德上的善與惡，都可用「良知」做尺度來衡量。依其觀點，在教育理念與實踐上，「良知」是本體，「致良知」是功夫，良知從本然走向明覺，必須以「致」——有「至」、「為」或「做」之義涵——為其中介。致良知功夫之具體內容，包括明心、盡心、求其放心、立志、自信、克己精察、靜處體悟、事上磨煉、實落用功、破除意見、去除昏蔽、知行合一、因材施教與循序漸進等。

陽明心學教育觀的積極意義至少有四：一是，以「良知」為先天依據，繼承、發揚孟子擴充善端的成人成聖路徑，強調了人在自我實現、希聖希賢歷程中的主體性；二是，以「心」、「良知」作為衡量一切是非的標準，客觀上起到了獨立思考的作用，表現出強烈的尊重個性的教育精神；三是，以「知行合一」肯定知行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重視知識教學與道德實踐的完整融合；四是，「致良知」的過程就是教育過程；教育的主要課題在如何「致此良知」，其所提各項功夫之具體內容與方法，在現代仍有諸多參考價值。

在由清末民初至 1950 年代社會政治的變遷背景中，為回應「新文化運動」所導致傳統儒學的式微，科學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詆孔孟、反傳統的學術文化偏執現象，中國興起了一批當代新儒家。他們遠溯先秦孔孟思想，近承宋明心性之學，並適度融攝近現代西方學術與佛學，分別、陸續提出不少對應時代課題所開展的新儒學精神方向。

若從較寬廣定義盱衡「當代新儒家」，學界目前大體已將其細分為三代：第一代人物有馬一浮（1883-1967）、熊十力（1885-1968）、張君勱（1887-1969）、梁漱溟（1893-1988）、馮友蘭（1895-1990）、錢穆（1895-1990）、方東美（1899-1977）、賀麟（1902-1992）（有些論著把錢穆、方東美列為第二代）等；第二代人物有徐復觀（1904-1982）、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

<sup>10</sup>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26〈大學問〉，頁 971。



(1909-1995)等；第三代人物有蔡仁厚(1930-2019)、余英時(1930-2021)、劉述先(1934-2016)、成中英(1935-)、杜維明(1940-)等。<sup>11</sup>

本文之研究對象為第三代當代新儒家杜維明，被譽為「儒家文化的布道者」<sup>12</sup>；「海外推展新儒學最力的一人」<sup>13</sup>；「當今世界最具有活力的儒家型的公眾知識分子之一」<sup>14</sup>。他真切認同陽明，並明顯吸取與應用陽明心學教育觀。其標誌主要有三：一是個人學思嚮往、服膺陽明學；二是對陽明心學有長期深入之研究，並針對陽明學發表了一定質量的論著；三是在自己的教育工作、講學活動及著述上充分應用了陽明心學教育觀。相關的研究文獻、杜氏的簡歷，他對陽明學說的吸取、對陽明心學教育觀的應用等，依序論述如下。

## 二、 相關研究文獻

學界與本研究主題有關之研究論著，尚在積累之中，茲分二大項擇要探討於後：

### (一) 對於杜氏的儒學思想之研究

1992年，韓強《現代新儒學心性理論述評》<sup>15</sup>以「人性的自我修養與儒學的現代化」主述杜氏的學思路向。指出，杜氏試圖在廣闊的領域中融合中西文化及哲學，解決科技成果與人文價值的衝突，並將儒學的精神價值與現代生活加以連結，創造出一個新的思想形態。不過，韓氏也提出若干疑問，認為杜氏的努力還是需要較長時間考驗。

<sup>11</sup> 參見鄭家棟，《現代新儒學概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劉述先等，《當代新儒家人物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鄭家棟，《當代新儒學論衡》（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方克立、鄭家棟，《現代新儒家人物與著作》（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劉述先等，《當代儒學發展之新契機》（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林安梧，《儒學革命論：後新儒家哲學的問題向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李翔海，《現代新儒學論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林安梧，《牟宗三前後：當代新儒家哲學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劉述先，《理一分殊與全球地域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等。

<sup>12</sup> 陳祖芬，《哈佛的證明》（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頁41。

<sup>13</sup> 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94；劉述先，〈從中心到邊緣：當代新儒學的歷史處境與文化理想〉（《漢學研究通訊》總76期，2000年11月），頁555—563。

<sup>14</sup> 景海峰，〈三十年的畜艾——《杜維明文集》出版感言〉（收於杜維明著《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和感悟（1966-197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32。

<sup>15</sup> 韓強，《現代新儒學心性理論述評》（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



2003年，魏彩霞《全球化時代中的儒學創新：杜維明的現代新儒學思想》<sup>16</sup>，指出杜氏探索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對其陰暗面和歷久彌新的價值作出分疏，從而凸顯出儒家的真精神。面對全球化的衝擊，他以一種不亢不卑的態度深入西方文明的骨髓，積極吸收西方啟蒙心態創造的諸如科學、民主、自由、法律等中國文化缺少但又是現代化所必需的普世價值。當然，杜氏也認識到，儒家在吸收西方啟蒙價值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其負面影響，即人類中心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產生的缺憾。對此，儒家的人文主義應該可以在構建全球倫理的過程發揮積極的作用。

2004年，方世忠《儒家傳統與現代性：杜維明新儒學思想研究》<sup>17</sup>，指出美國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在其《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創制了「博物館化」（museumization）這一著名比喻，借以說明儒家傳統業已死亡。作為一個奔走於全球弘傳儒家思想的學者，杜維明在相當長時間內都在試圖回應列文森的問題，並從文化哲學角度探究儒家傳統與現代性的複雜關係。同為2004年，胡治洪《全球語境中的儒家論說：杜維明新儒學思想研究》<sup>18</sup>，構建了杜氏儒學思想的基本結構，有助於吾人了解當今全球學界儒學討論的概況。

2005年，顧紅亮〈對德性之知的再闡釋——論杜維明的體知概念〉<sup>19</sup>，指出杜氏的體知概念是在默會知識與儒家思想的現代性的雙重語境下對儒家的德性之知傳統所作的一種新詮釋。體知是那種與認知相對、與實踐結合體現人格尊嚴的認識，具有認識的意義和實踐的意義。杜氏對體知概念的論述和波蘭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67）的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觀上的建構工作有不少相近之處，兩者都對科學知識觀念提出質疑，為知識觀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2010年，李翔海《現代新儒學論要》將杜維明定位為「尊德性」路向，即堅持「德性優

<sup>16</sup> 魏彩霞，《全球化時代中的儒學創新：杜維明的現代新儒學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sup>17</sup> 方世忠，《儒家傳統與現代性：杜維明新儒學思想研究》（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2004年）。

<sup>18</sup> 胡治洪，《全球語境中的儒家論說：杜維明新儒學思想研究》（北京：三聯出版社，2004年）。

<sup>19</sup> 顧紅亮，〈對德性之知的再闡釋——論杜維明的體知概念〉（《孔子研究》2005年第3期，2005年9月），頁105-111。





先」的理論立場，沿著王陽明、熊十力、牟宗三路徑而發展。<sup>20</sup>2011年，林安梧《牟宗三前後：當代新儒家哲學思想史論》判定杜維明傳承了牟氏尊崇陸王心學為孔孟儒學的主流以及心性之學是儒學核心的主張。但對此，林氏認為杜氏這一立場，把儒學窄化了。在林氏看來，傳統儒學之發展「應該說是多元的」<sup>21</sup>。

## （二）針對杜氏的教育理念之研究

1997年，馬東玉〈當代新儒家人文教育評述〉<sup>22</sup>，此文綜述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經第二代牟宗三，再到二十世紀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奔走於世界各地的第三代杜維明等人的人文教育。指出現代科技大發展，市場經濟主宰社會人生，人們生活水平大提高，與人的道德品質形成極大反差。如何扭轉？新儒家設計了許多方案，而改革教育，加強人文建設是他們的重要辦法之一。

2006年，劉雪飛、李建〈杜維明論「誠」與「成人」教育〉<sup>23</sup>指出，杜維明近年來積極倡導「成人」的人文教育理念，並以「誠」的傳統精神做理論上的依托：以「終極的自我轉化」為核心的求「誠」觀，強調以自我道德意識的提升作為教育的根本屬性和首要關切；這一獨具特色的思想，對於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當代教育之片面追求實效的功利主義傾向，以及現代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有救正意義，對於當前的通識教育也有積極的啟示作用。

2017年，張娜〈體知與審美教育〉<sup>24</sup>指出，杜維明於1985年提出「體知」概念，以詮釋不同於主體與客體、道德與知識兩分的現代知識論。個體的審美無疑是一種身心感知過程，單獨邏輯分析與現象描述並不能完成美感之體驗與境界之升華，這就需要「體知」與語言之結合。將體知應用於審美教育，能使個體在實踐過程中實現對二元關係之超越，真正在實踐中

<sup>20</sup> 李翔海，《現代新儒學論要》，頁26-35；頁51-58。

<sup>21</sup> 林安梧，《牟宗三前後：當代新儒家哲學思想史論》，頁137-151。

<sup>22</sup> 馬東玉，〈當代新儒家人文教育評述〉（《遼東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4期，1997年7月），頁67-70。

<sup>23</sup> 劉雪飛、李建，〈杜維明論「誠」與「成人」教育〉（《繼續教育研究》2006年第6期，2006年7月），頁107-108。

<sup>24</sup> 張娜，〈體知與審美教育〉（《阜陽師範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2017年6月），頁88-91。



實現審美教育，從而提高大眾審美教育的質量，予人們發現美的眼睛與感受美的心，在生活如此喧嚷浮躁的今天，給人們以心靈的憩息所。

2018年，孫荻〈杜維明的教育理論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sup>25</sup>，認為杜氏對古典儒學意義上的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作過深刻闡釋，其教育觀對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有三：一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應具有階段性，二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與新媒體結合，三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培養適應社會發展的人。由

由上可知，已有一些學者探論了杜維明，這些對於杜氏的研究，大體都能以他的原典著述為據，不僅探討其學思歷程、儒學思想、教育理念等，同時就他在二十世紀後期及二十一世紀初期學術發展上扮演的角色、思想特點及其侷限等加以論究，各有論點與發現。由「前言」及「相關研究文獻」的「(二)針對杜氏的教育理念之研究」所述可知，杜維明有豐富的教育經驗與教育理念，一定程度的吸取陽明心學教育觀，並將其精華應用、體現於授課、講學與著述中，形成一股教育力量，有其特色。可惜截至目前，學界對這部分的研究論著，仍鮮少，且從他吸取與應用陽明心學教育觀切入，加以分析的研究，則尚付闕如，確實還有很多的探討空間。

### 三、杜氏的簡歷與思想主軸

杜維明，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2月26日出生於雲南昆明。1945年，隨家遷上海。1949年，隨家遷臺灣臺北。1951年，11歲起開始接觸王陽明詩文。1961年畢業於東海大學中文系，翌年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前往美國深造。1963年獲得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1966年回臺任教於東海大學——在通才教育的計畫中開授「文化認同與社會變遷」一門專門探索中國思想現代化進程中儒學復興的課程。<sup>26</sup>1968年取得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學博士學位後，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1968-1971年，助理教授）、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1971-1981年，1973年升副教授，1977年升教授）；1981年始任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教授，至2010年榮休，期間並在臺灣大學、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法國高等學院講授儒學。在哈佛大學曾擔任該校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1984-1987年）、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系主任

<sup>25</sup> 孫荻，〈杜維明的教育理論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商情》2018年34期，2018年10月），頁241-242。

<sup>26</sup> 杜維明，《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和感悟（1966-1970）》，〈再版序〉，頁3。





(1986-1989年)。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1996年至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長；2001年應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之邀，參加「文明對話」顧問委員會。2010年迄今為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2018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自青少年起，杜維明即立志要走儒學之路。他自述：「我認同儒學甚早，沒有考進大學就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sup>27</sup>基本上，他是以一種非常肯定的眼光來詮釋儒學傳統，而對於它為人詬病之處並未全然漠視。他說：

半個多世紀以來，在西方的中國學者和大部分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都注重所謂的儒家文化的「陰暗面」。作為一個思想史學家，我當然敏銳地注意到儒家對傳統的和現代的中國所起的負面作用(如專制政治、老人政治及男性取向等)。……然而，我並不認為儒學的命運便已經就此決定了。相反，儒家思想作為中國主要思想力量再度出現的真實可能性是存在的。<sup>28</sup>

50年來，杜氏致力於儒學第三期的發展、儒家資源的探索、文化中國的傳播、文明的對話，及現代精神的反思等。其著作豐碩：關於陽明學之鑽研者，有《青年王陽明》(此書即杜氏博士論文《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ng's Youth (1472-1509)》的中文版)、〈一個真實的人——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周年〉<sup>29</sup>、〈王陽明答周道書五封〉<sup>30</sup>、〈日本天理大學藏「王陽明講學答問並尺牘」卷初探〉<sup>31</sup>、〈主體性與存有論實在——王陽明思維模式闡述〉<sup>32</sup>、〈王陽明四句教探究〉<sup>33</sup>、〈從宋明儒學的觀點看「知行合一」〉<sup>34</sup>等；關於儒家資源之探索者，有《否極泰來：新軸心時代的儒家資源》、《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儒家思

<sup>27</sup> 杜維明，《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和感悟（1966-1970）》，〈再版序〉，頁4。

<sup>28</sup> 杜維明，《人性與自我修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導言〉，頁11-12。

<sup>29</sup>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1972年5月26日〈人間副刊〉（頁8），後收於氏著《人文心靈的震盪》（臺北：時報文化事業公司，1976年），頁47-54。

<sup>30</sup> 此文刊於《大陸雜誌》第47卷第2期，1973年8月，頁7-13。

<sup>31</sup> 此文刊於《大陸雜誌》第46卷第3期，1973年3月，頁28-35。

<sup>32</sup> 此文收於氏著《人性與自我修養》，頁185-214。

<sup>33</sup> 此文收於氏著《人性與自我修養》，頁215-233。

<sup>34</sup> 此文收於氏著《人性與自我修養》，頁113-138。



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仁與修身：儒家思想論集》、《道、學、政：論儒家知識分子》、《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等；關於儒學第三期之發展者，有《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二十一世紀的儒學》、《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杜維明新儒學論著輯要》等；關於文化中國之傳播者，有《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杜維明學術文化隨筆》、《我們的宗教：儒教》等；關於文明之對話者，有《文明對話中的儒家：21世紀訪談》、《體知儒學：儒家當代價值的九次對話》、《天與人：儒學走向世界的前瞻：杜維明、范曾對話》、《對話的文明：池田大作與杜維明對談集》、《杜維明：文明的衝突與對話》、《儒家傳統與文明對話》等；關於現代精神之反思者，有《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人性與自我修養》、《東亞價值與多元現代性》、《十年機緣待儒學：東亞價值再評價》、《儒家自我意識的反省》等；關於教育議題之省察者，有〈從中國思想研究看臺灣——向臺灣大專教育進一言〉、〈從博士到教授——漫談美國的學術界〉（以上二文收於《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和感悟（1966-1970）》），〈美國大學教育的認同危機〉、〈美國大學言論自由遇考驗〉（以上二文收於《人文心靈的震盪》），〈修身：體現人性的教育〉（此文收於氏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學術思想文選》），〈寒流下的暖流——高標理想的美國研究生〉、〈宋儒教育觀念的前景〉、〈儒家教育理念——當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儒家人文關懷與大學教育理念——在岳麓書院創建 1020 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以上四文分別收於氏著，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 1 冊、第 5 冊）等。

對於儒學的資源、價值，杜維明強調儒學是「為己之學」、「身心性命之學」。「為己之學」的中心點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己」，不是一個孤立而絕緣的個體，而是一個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間所顯現的完整的人格發展。因此，要完成自己的人格，不可避免地要對社會承擔起責任。「儒家所建構的這樣一套相當複雜、深厚的人格發展形態，在世界文明中，有著十分獨特的價值」。究竟儒學的基本精神為何，杜氏說：

（儒學）所代表的是一種涵蓋性很強的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和西方那種反自然、反神學的人文主義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萬物一體。這種人文主義，是入世的，要參與現實政治，但是又不是現實政權勢力的一個環節，有著相當深厚的批判精神，



即力圖通過道德理想來轉化現實政治。<sup>35</sup>

如何踐行儒學第三期發展，杜氏主張一方面要擺脫、批判儒學傳統中的封建遺毒；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其優質的思想文化價值；第三方面，要對儒學作「創造的轉化」——先同情的了解先儒的思想，掌握其「健康的精神」，再運用當代的語言講述之，使其落實於當今社會。<sup>36</sup>他所謂儒家傳統「健康的精神」，有人生哲學、正向的人性論、修養論、天人合一的倫理學、自覺之啟發的教育學，以及政經方面之信賴機制等。<sup>37</sup>當今發展儒學的實踐過程中，他強調務必採取「開放的心靈」，一則揭露儒家傳統的陰暗面，二則理解儒家思想的正面價值，三則通過「多元文化」的比較與對話，讓儒學在現代與未來維持其生命力。<sup>38</sup>

#### 四、 杜氏對陽明心學的吸收

杜維明從少年時代即接觸陽明學。他自述：

我第一次接觸陽明的詩文和學說是在（建國中學）初中（部）一年級（1951年），那時就意識到他（陽明）的價值趨向和世俗的忠孝單元論很不相類。後來逐漸摸索，才發現陽明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人之學，根本和專制王朝所要求的「同心同德」大異其趣。<sup>39</sup>

當他繼續探索陽明的世界，發現陽明富贍一種強烈的批判態度和抗議精神，諸如反對虛偽的社會禮俗，評驚僵化的科舉考試制度，議斥受宦官汙吏所僭取的專制政治勢力。特別是針對陽明在正德初以論救言官戴銑（？—1506）等忤劉瑾（1451—1510），仗闕下，謫貴州龍場，杜氏表明：「陽明這種不妥協的風骨和孟子所謂『殺一獨夫』<sup>40</sup>的氣魄真是先後大哲如合符節。」

<sup>35</sup> 杜維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頁8—10。

<sup>36</sup> 杜維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頁15、20、46。

<sup>37</sup> 杜維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頁49、163、169。

<sup>38</sup> 杜維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頁52、117。

<sup>39</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一個真實的人——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週年〉，頁50。

<sup>40</sup> 「殺一獨夫」語出《孟子·梁惠王下》，原文是：「（齊宣王）曰：『臣弑其君可夫？』（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21-222）。



<sup>41</sup>他為「體知」(參後)陽明當年在龍場「居夷處困」而「大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sup>42</sup>的情境，特別於1994年3月3日到貴州修文縣參訪陽明故居。<sup>43</sup>

在杜維明的認知中，陽明是一個真實無妄的人——不僅是自我內在證驗儒家心性之學，而且是有血有肉在現實社會裡體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儒。<sup>44</sup>他指出：

我在王學中找到了一種極富動力的人生哲學，就是他(陽明)根本不注重外在的事功，他拒絕把「百死千難」中悟得的「內在真理」筆之於書(因為他不相信沒有實行的空談)，他尤其反對裝著一付聖人模樣而到處誑己誑人的勾當。陽明寧願拋棄一切虛偽的榮耀，而去作一個真實的人。<sup>45</sup>

陽明饒富生命動力的人生哲學，已然成為杜維明由成長而茁壯的津梁。

在深入認識與理解儒學重鎮之一的陽明思想的過程中，杜維明陸續得到當代新儒家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第二代三位都是追隨陽明良知說<sup>46</sup>的師長之指導和啟迪。<sup>47</sup>1955年暑假期間，他在臺灣師範大學「人文講會」旁聽牟宗三講授「中國哲學」課程，其中有「惻隱之心與良知」、「心性之學」、「王學的歧出」、「王學的正解」等議題。<sup>48</sup>隔年8月，在臺北市郊淡水竹林初謁唐君毅，時已讀過唐氏的《心物與人生》等著作。1958年，從東海大學外文系轉

<sup>41</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一個真實的人——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週年〉，頁50。

<sup>42</sup> 杜維明著，朱志方譯，《青年王陽明》(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頁161。

<sup>43</sup> 杜維明著，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2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年)，圖頁2。

<sup>44</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儒家心性之學〉，頁38-39。

<sup>45</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一個真實的人——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週年〉，頁51。

<sup>46</sup> 有關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三人追隨陽明良知說的軌跡，可參見黃文樹〈徐復觀對陽明心學教育觀的理解與應用〉(《南臺人文社會學報》第25期，2021年11月，頁69-106)；史炳軍、趙茂林〈唐君毅對陸王心學的繼承與超越——評唐君毅的心本論〉(《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3期，2001年9月，頁46-52)；李彥儀〈牟宗三對王陽明「致良知」的理解與詮釋——以「致知疑難」為核心的討論〉(《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6期，2009年6月，頁171-196)；李瑞全〈唐、牟二先生之陽明學——兼論朱陸異同〉(《新亞學報》第28期，2010年6月，頁13-23)；劉宗賢、蔡德貴《陽明學與當代新儒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等。

<sup>47</sup> 杜維明著，朱志方譯，《青年王陽明》，頁1；杜維明，《否極泰來：新軸心時代的儒家資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前言〉，頁3。

<sup>48</sup> 參見牟宗三主講，蔡仁厚輯錄，《人文講習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胡治洪，鄭文龍編，〈杜維明年譜簡編〉(收於杜維明著，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5冊)，頁716。



入中文系，隨徐復觀攻讀儒學。<sup>49</sup>他在 1983 年說：

徐復觀先生是我的恩師。我從（東海）大學二年級因受他的感召，轉入中文系專攻中國哲學以來，復觀師無時無刻不指引著我步入中國歷史、文學和思想的田地。……（至於）我的運思途徑啟蒙恩師牟宗三先生點化後，30 年來沒有大幅度的改變。<sup>50</sup>

1966 年，他到香港，「在業師牟宗三家問學一個多月」<sup>51</sup>，請示朱王兩家思想異同；之後又特別飛到日本，他表示：

去探望那時在京都治眼疾的唐君毅老師，有緣和他一起從京都到天理到奈良。……與唐先生一路談（陽明）心學，集中討論「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關係，受益良多。……當時我有參透陽明「致良知」之教的雄心壯志。<sup>52</sup>

還有，1969 年夏季，唐君毅因參加「第五屆東西哲學家會議」，順便在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的暑期講授宋明儒學，杜氏「榮幸地聆聽了五個星期的課，獲得了許多啟示。」<sup>53</sup>這些點出杜氏多次向唐氏請益陽明學的實情。

王陽明在杜維明心目中，有著非常崇高的地位，他將陽明比喻為西方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1483-1546），盛讚他使儒聖之道普及化、大眾化。杜氏在《青年王陽明》序言指出：

王陽明是儒學傳統中最活躍的思想家之一。……他本人重身教而不只是言教。……在他的影響之下，孔孟之道不再被看作是只有讀書人才能走的路。孔孟之道成了一切人的道路。……陽明對儒學所作貢獻同馬丁路德對基督教所作的貢獻一樣深刻。<sup>54</sup>

顯而易見，杜氏非常肯定陽明將儒家思想落實到民間的歷史意義。另外，杜氏十分推崇陽明的事功：「陽明既有思想創新，又能把新觀念創造性地應用到軍事謀略、社會組織、地方政府

<sup>49</sup> 胡治洪、鄭文龍編，〈杜維明年譜簡編〉，頁 716。

<sup>50</sup>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為往聖繼絕學〉，頁 400。

<sup>51</sup> 杜維明，《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和感悟（1966-1970）》，〈再版序〉，頁 3。

<sup>52</sup>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儒學第三期：探索、自覺與創造性轉化（自序）〉，頁 3。

<sup>53</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頁 58。

<sup>54</sup> 杜維明著，朱志方譯，《青年王陽明》，頁 1-2。





的治理上。在這兩個方面都閃耀著燦爛光芒的儒學宗師，中國歷史上唯有王陽明一人」。<sup>55</sup>

《青年王陽明》一書，是杜維明 1968 年向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學系提交的英文博士論文，旨在由心理學認同的角度去闡發陽明立志追求成聖成賢的探索歷程。杜氏在研撰該書之際，即已自陳得力於陽明，他說：「陽明的精神路向代表了寬廣的儒學場境之內的一條有意義的發展路線。……我實際上受益於王陽明本人關於真正的儒學路向應該如何的見解」。<sup>56</sup>這條路徑，即把「身與心」結合、「知行合一」，「內在自由」（內聖）與「社會參與」（投身於社會）兼重的一條最真切的人生道路。

## 五、杜氏對陽明心學教育觀的應用

杜維明曾在《人性與自我修養》一書自述探究陽明心學及此一治學蘊向對自己的生命與學術發展之意涵，他說：

1968 年我完成了以分析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為主題的(哈佛)博士論文，正式走上以教研為主要關切的學術之旅，陽明的「致良知」一直是我所關切的哲學問題。……我深信通過對塑造儒家傳統有貢獻的人物的理解來闡述身心性命之學的真实內涵，不僅有助於對儒家哲學的中心價值進行深層的反思，而且可以為獲取儒門的人生智慧創造良好的條件。<sup>57</sup>

這段話顯示杜氏以陽明心學為中心的「儒門家法」，在他的生命與學術旅程上的關鍵性意義與作用。

在教育課題上，杜維明植基於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之教及身心合一之學，倡導「社會良心」、「士的自覺」、「體知」、「習明納」(seminar)、「修身與身教」、「靈性培養」，強調儒家倫理價值，以及鼓吹「傳道精神」等理念與作法。換言之，杜氏在廣泛且深入吸取陽明心學之後，將其精粹多方面應用於自己的教學、講學與著述中，此處歸納為七項分別說明之。

(一) 以陽明人格典範期許現代知識人扮演「社會良心」

儒家傳統教育理念，向以理想人格、修養境界作為德育最高目標，繼承這一思想遺產的

<sup>55</sup> 杜維明著，朱志方譯，《青年王陽明》，頁 2。

<sup>56</sup> 杜維明著，朱志方譯，《青年王陽明》，頁 7。

<sup>57</sup> 杜維明，《人性與自我修養》，〈聯經中文版自序〉，頁 2-3。



杜維明強調：「人生最吃緊的關頭是人格的陶冶」。<sup>58</sup>依心理學的解釋，「人格」(personality)一詞，「指個體在其生活歷程中對人、對事、對己以至對整體環境適應時，所顯示的獨特個性。」<sup>59</sup>這是屬於不帶價值判斷的解釋。而在教育上使用「人格」時，則往往與「人格」(character)通用，且偏重以德行修養來評定。作為教育家兼儒者的杜氏，此處所提出之「人格」顯然是從教育的立場切入。

前述杜維明視陽明是一位真實無妄的人格典範，他由此期許：「現代知識分子應該是一群代表人性光輝的社會良心」<sup>60</sup>——即作一個具有儒家靈魂而具體實踐社會關懷的知識人，也就是對於社會風氣的腐蝕，政治權勢的專制，或經濟結構的迫壓等，有一「敏感性」，從而提出針砭與改善之道。杜氏所謂的「知識人」或「知識分子」，指「具有敏感性和反省性，而且可以超出時空的限制，對人類社會負文化和歷史的責任」；「真正的知識分子不能不本著良心來批判現實，為道德理性作見證」。<sup>61</sup>他指出，當知識分子對社會失去靈性，如同程顥(1032-1085)<sup>62</sup>在《識仁篇》所評論的「麻木不仁」現象，後來陽明又把程氏的意思加以引申，「如果用陽明的見解來分析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大悲劇，那麼最嚴重的表徵即是失去了作為一個真實的人必須具備的『敏感性』。」<sup>63</sup>

如何扮演現代知識分子？杜維明給的答案是：「他們應有極敏感的觸覺和極高遠的見識；他們應和人類全體保持精神的交通，和社會大眾保持緊密的接觸，和自己所屬的群體保持血肉的關連。」<sup>64</sup>相反的，「當知識分子一旦自棄了讀書人應有的敏感性，那麼不僅陽明『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人之學變成虛脫，就連顏元<sup>65</sup>所說的轉世精神也變成空談了。」<sup>66</sup>在杜氏

<sup>58</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胸中的風暴〉，頁 110。

<sup>59</sup> 張春興，《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東華書局，1989年)，〈人格〉條，頁 480。

<sup>60</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一個真實的人——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週年〉，頁 51。

<sup>61</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美國的「智識分子」〉，頁 148。

<sup>62</sup> 程顥，號明道。北宋嘉佑 2 年(1057)進士，歷官鄆縣主簿、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等，著有《識仁篇》、《定性書》等，配祀孔廟。

<sup>63</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一個真實的人——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週年〉，頁 51。

<sup>64</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一個真實的人——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週年〉，頁 51-52。

<sup>65</sup> 顏元(1635-1704)，號習齋。任教於漳南書院。著有《存學篇》、《存性篇》、《四書正誤》等。



看來，知識人若有陽明的社會批判與抗議精神就不致淪為政治特權階級的附庸或國際資本企業的買辦。

## （二）提倡陽明所體現的「士的自覺」與「體知」的工夫路徑

吾人應如何「為學」與「修養」，是攸關是否「成學」與「成人」的工夫途徑。「為學」泛指學習的行為或活動；「修養」則指德性涵養之方。在這方面，杜維明從陽明的身心之學尋得養料。杜氏自陳：「我的學術自覺是建立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而文化自覺的前提是個人的自覺。……這是一條紮根體驗的『身心性命』之途」。<sup>67</sup>這是他應用孟子、陸象山到王陽明心學而推引出的「士的自覺」觀點。他明白說：他所寫的陸象山、王陽明、熊十力等，「皆是真能體現孟子『士的自覺』的儒家」。<sup>68</sup>

至於如何真正習得儒家身心之學的精髓，杜維明揭櫫「體知」(embodied knowing) 方法論。他早年即定下志業：「要通過對儒家大師大德的『體知』而逐步展現儒家身心性命之學的精義，是我早已凝定的志向」。<sup>69</sup>在儒家大師大德中，「王陽明是一個『身心之學』的『模範教師』」。<sup>70</sup>依其說法，「體知」相當於「體會」、「體悟」、「體驗」、「體察」。其中，「體」是動詞，即是「身體力行」的體，含有「親身體驗」或「設身處地著想」的意思。「知」是一個心理動詞，含認知與體驗。「體知」，即「體之於身」的感知，是一種動態的過程。<sup>71</sup>依其觀點，「德性之知」依賴內在道德的自覺與體證，與一般「見聞之知」分屬兩個不同的層次。體知也就是體道。

杜維明認為，儒家的心性之學，不但是哲學思想——一種理性的思辨、觀念的釐清，而

<sup>66</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一個真實的人——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週年〉，頁 52。

<sup>67</sup>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儒學第三期：探索、自覺與創造性轉化（自序）〉，頁 1。

<sup>68</sup>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儒學第三期：探索、自覺與創造性轉化（自序）〉，頁 8。

<sup>69</sup>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儒學第三期：探索、自覺與創造性轉化（自序）〉，頁 2。

<sup>70</sup>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主體性與存有論實在〉，頁 282。

<sup>71</sup>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論儒家的「體知」〉，頁 115-121；杜維明，《否極泰來：新軸心時代的儒家資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前言〉，頁 2。



且是宗教體驗——一種信念的皈依、情感的超昇。<sup>72</sup>他說：

在中國文化的傳承裡，自生民以來，孔子的人格修養實在最為圓熟，也最近乎理想。

這個信念……多半是大儒們（如孟子、朱熹、王陽明等）身體力行，從功夫上體認、

印證所得到的結論，並不單是從理智上的思辨所推想到的，當然更不是盲目的崇拜。<sup>73</sup>

杜氏又說：「讀《論語》、《孟子》是要在生命的底層引起質的變化，讀宋明語錄是要在人格的內部涵養真的性靈，這即是所謂的『實學』」<sup>74</sup>；「如何作一個儒者即等於如何作一個真實和完整的人。只有在人性的本質層，引發自覺的真幾才是儒家體驗之學的靈魂。」<sup>75</sup>在他看來，真正的儒者，必定內蘊儒家的靈魂。如果沒有儒家的靈魂，那些在外表形象上循規蹈矩地服從道德制約者，頂多也不過是一個鄉愿型迂儒罷了。

### （三）從陽明「知行合一」之教推衍「習明納」教學法

依杜維明的觀點，「知行合一」之教於 1509 年由陽明揭櫫並闡述之後，可以被認為是整個儒家學說的中心思想之一。「知」不只是「認識的能力」，也是「一種內省的形式」；「行」不只是「行動的功能」，也是一種「反省思考的實現」，而「合一」則意味著「知」與「行」的統一或同一，「用陽明自己的話說就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這樣，知、行的不可分割不只是一個折中的權衡之計，而是對知行的真實本質的描述。<sup>76</sup>

按杜氏的理解，陽明的「知行合一」理論，強調了成人成德歷程中的主體性——由「自我認識」到「自我實現」過程中，人的主體性變成了一種真實的經驗，而非抽象的概念。「知行合一」的焦點，集中在思想與實踐的連結上，因而溝通了內與外。就實踐活動而言，陽明極其嚴肅地認為，學習者首先須確信自我內在「良知」，並在「成為真實的人」目標上作出承諾，經驗的知識才會變成自我的知識。如此，才有了「頭腦」。在這個意義上，「知」不僅僅

<sup>72</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儒家心性之學〉，頁 34。

<sup>73</sup> 杜維明，《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和感悟（1966-1970）》，〈漫談儒家的品題人物〉，頁 88。

<sup>74</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體驗邊緣的問題〉，頁 16。

<sup>75</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體驗邊緣的問題〉，頁 17。

<sup>76</sup> 杜維明，《人性與自我修養》，〈從宋明儒學的觀點看「知行合一」〉，頁 128-129。



是從事一種領悟外在事物超然的心理活動，乃是去注意踐行的領悟本身如何在具體的行為中完全實現。而在「行」的過程中，已產生的行為可在自我知覺的脈絡中獲得有意義的確認。<sup>77</sup>

杜維明的教學方式除講述法之外，也採取「習明納」。原本費孝通（1910 - 2005）將 seminar 譯為「席明納」，取席地而坐越辯越明、海納百川的意思。但杜氏從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得到啟示，把「席」字，改為「習」字，強調身心合一的實習、踐行。其課程教學進行方式大體是：每週固定一個半天舉行，提報告的人不超出兩人，但參加討論的少則 20、30 人，多則 50、60 人。中間休息 30 分鐘。

#### （四）援引陽明「實落用功」理念詮釋「修身」與「身教」之意涵

「實落用功」是陽明教學過程中經常提示門下的功夫概念。《傳習錄下》載：一友請教「學問的真切功夫」何在，陽明云：「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陽明答：「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對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陽明云：「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sup>78</sup>據〈年譜〉載：正德 16 年（1521）正月，時居江西南昌的陽明向弟子們正式揭示「致良知之教」。蓋自前一段時間（正德 14 年-15 年）經過朱宸濠（1476-1521）之亂及佞臣張忠、許泰之變難，讓陽明「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陽明云：「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沉溺之患矣。」<sup>79</sup>「致良知」之理簡易明白，但他擔心的，就像前面那位只在語言上討究文義，而未「實落用功」之輩。陽明喟然發嘆：「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sup>80</sup>顯而易見，陽明一再強調「實落用功」，就是不可懸空，不可只掛在嘴巴上，而要真切篤實去踐行，如他所說：「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

<sup>77</sup> 杜維明，《人性與自我修養》，〈主體性與存有論實在——王陽明思維模式闡述〉，頁 194-198。

<sup>78</sup>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3〈傳習錄下〉，頁 109。

<sup>79</sup>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34〈年譜二〉，頁 1278-1279。

<sup>80</sup>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34〈年譜二〉，頁 1279。





夫。」<sup>81</sup>

從陽明「實落用功」得到啟示，杜維明強調教學歷程中，真切篤實地「修身」與「身教」的重要性。他在〈修身：體現人性的教育〉一文指出，「儒家教育以德性之建立為首要目的，而其起點和靈感之源則是『修身』。」<sup>82</sup>「修身」是「作為學習成為人的方式」<sup>83</sup>。依杜氏的觀點，每一個人都可以「修身」，理由是：情感、意志、知性以及覺解的心量是人性所固有的。仁、義、禮、智等德行可以通過直接訴諸人的基本感知力——同情、同感、恥惡心、辨別義與非義的能力以及恰當的意識——而獲得涵義。<sup>84</sup>他說，陸象山、王陽明等宋明儒者所實踐的「教育」——「是個人通過修身學到知識的一個途徑」；而「學習」——「是體現個人身教內容的方法」。因此，「修身」與「身教」無縫搭配是教學的極佳原則。杜氏認為，緣於此，故宋明大儒往往把他們的學問稱為「身心之學」。為此，杜氏引用了陽明所提「實落用功」的概念來詮釋「修身」與「身教」的真義。<sup>85</sup>

對於這種由「實落用功」理念為核心，包含「修身」與「身教」的「身心之學」，杜維明引用陽明的觀點指出：

用人的整個身心去思考，……是一種對個人生活性質進行察、味、認、會、證、驗的方法。隱藏在這種反省之下的是挖掘和鑽研的過程，而此過程必然導致人們對自我有一覺察：自我不是一個精神的建築，而是一個被體驗到的實在。王陽明指出，當他的觀念脫離了具體經驗的基礎時，它們就變成了一堆空話。他說：「良知說……，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陽明在這裏……把身教內在化了。<sup>86</sup>

<sup>81</sup>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1〈傳習錄上〉，頁27。

<sup>82</sup>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修身：體現人性的教育〉，頁126。

<sup>83</sup> 杜維明著，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4冊，〈修身〉，頁609。

<sup>84</sup> 杜維明著，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4冊，〈修身〉，頁612。

<sup>85</sup>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內在體驗：宋明儒學思想中的創造性基礎〉，頁31—32。

<sup>86</sup>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內在體驗：宋明儒學思想中的創造性基礎〉，頁32。



上面杜氏這番「身心之學」的詮釋，強調教育是個人通過「內在體驗」學到知識，淨化心靈，涵養德性，並做出躬身踐行的一個途徑。

(五) 取資陽明「良知說」以聲言「靈性培養」的重要性

自 1960 年代中期至今，理工當紅，科技掛帥，人文教育相對式微，杜維明鑒於這種文理教育失衡的偏頗現象，感到憂心。他在 1967 年發表〈從中國思想研究看臺灣——向臺灣大專教育進一言〉預警道：

數年來，臺灣教育當局傾力發展自然科學，是否能夠獲得預期的效果姑且不論，……如果因為過分重視自然科學而令社會科學及人文學自生自滅，……（那麼）不但播的新種不能發芽，就是該收成的也（將）被連根拔起了。<sup>87</sup>

1973 年，杜氏又在〈反省的證道者〉一文檢討指出，晚近我國學術界與教育界，「被科學主義和實用主義所控制，造成一種只要求在社會中當下兌現的意識型態。」雖然培養了一批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面的人才，「但是在文學、哲學、宗教、歷史等人文學術的領域中，這半世紀真是不堪回首。」<sup>88</sup>其窘況是：

連最具創發性的心靈也因受環境的驅迫而洗脫不掉酸腐的文人氣息，等而下之者不是缺乏真實生命的悠悠名士就是依附權勢的清客幕友，能夠擇善固執為文化事業作一番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就不多見，至於有歷史意識，有社會良心，並且有文化展望的思想家那就真是如鳳毛麟角般的稀有了。<sup>89</sup>

這些針對近年來國內人文教育的省察與評議，應是中肯的。

基於上面省思，杜維明進一步質疑道：

人性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社會的發展總要靠各層面之間的協調，融合並進。試想，如果一個教育制度僅能培養出一批毫無文化和歷史意識的科技人才，他們既對國家民族沒有真切的認同感（真認同和不經批判的接受權威是大相逕庭的），那麼他們又如何能

<sup>87</sup> 杜維明，《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和感悟（1966-1970）》，〈從中國思想研究看臺灣——向臺灣大專教育進一言〉，頁 92。

<sup>88</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頁 82-83。

<sup>89</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反省的證道者〉，頁 83。



超越自己的有限存在，為一較大的群體而進行適應現代化的工作？<sup>90</sup>

他鄭重表示：「沒有文化和歷史意識的個人或民族，即使擁有一輩子享用不盡的財富仍不免是缺乏靈性的產物。」<sup>91</sup>而靈性的培養，則可取資陽明「良知說」。依杜維明的觀點，吾人的靈性，一如陽明〈詠良知〉<sup>92</sup>中所講的「自家無盡寶藏」，我們應當把它發掘出來，由之開展人生的康莊大道。<sup>93</sup>在杜氏看來，良知就在每個人心中，保育與復明真誠惻怛、湛然活潑的良知心，是社會問題意識之基，也是歷史文化意識之本。故他說：「無論累積了多少經驗知識，道德力的提高都須待心靈的恰當修養。因此，在王陽明的修身哲學中，作為淨化動機之努力的誠意優先於對事物的探究。」<sup>94</sup>

靈性的培養，除了向內發掘先天的自家無盡寶藏——良知之外，杜維明也留意後天學校教育規劃與設計的影響機制。他回顧1960年前後就讀東海大學中文系時，學校整體教育氛圍，特別是重視通才教育方面，帶給他許多正面的影響。他說：

東海大學的通才教育為我提供了超越所謂「古今中西之爭」的人文視野。中文系通過專書導讀的途徑和文史哲並重的課程，讓我認識、理解和體會漢字、詩詞歌賦和歷代文章之美，甲骨金文及個體書寫文字史料之真和諸子百家思想智慧之善。……來自英美精英大學，如劍橋、奧柏林、耶魯和普林斯頓的青年英語教師，把只有600名本科生的東海校園中點綴成了跨文化交流和對話的道場。<sup>95</sup>

依其觀察，東海大學當年通才教育的經驗是足資借鏡的。

<sup>90</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了解自己的發掘工作〉，頁79。

<sup>91</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了解自己的發掘工作〉，頁78。

<sup>92</sup> 陽明〈詠良知〉詩，全名為〈詠良知四首示諸生〉，全詩如下：「（其一）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其二）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其三）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其四）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詳見《王陽明全集》卷20，頁790）

<sup>93</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了解自己的發掘工作〉，頁80。

<sup>94</sup> 杜維明著，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4冊，〈修身〉，頁626。

<sup>95</sup>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儒學第三期：探索、自覺與創造性轉化（自序）〉，頁1。



(六) 發揮陽明心學之益於海內外以弘傳儒家倫理價值

1981年起，杜維明轉到哈佛大學任教，經過三年的努力，將「儒家倫理」納入該校「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項目之中，成為核心課程之一。<sup>96</sup>根據陳祖芬在《哈佛的證明》一書所述，杜氏在哈佛大學開授「儒家倫理」課程，原先地點是普通教室，但後來學生太多，改於梯形教室上課。不久，學生又坐不下來，再調整到禮堂授課，甚至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劇院講課。<sup>97</sup>親自在杜氏課堂現場參與觀察的陳祖芬有下面生動的紀錄：

山得斯的一二層，滿滿坐著六七百學生。開始，杜維明看到教室的地上、門外都擠坐著學生，說希望你們不要走錯了地方——他自己也沒有想到會一下子來這麼多聽眾。……當然，杜維明是用英語講演。……他左手半插在褲兜裡，右手比畫著在講臺上走來走去，儒雅而風度(翩翩)。……他著力講話時，……整個人有一種執拗的牛勁，……牛似的全力衝向一個目標。<sup>98</sup>

由這段描寫，可見杜氏授課之吸引學生及其精彩樣貌。

杜維明多年來孜孜於美國學術界與高等教育學府，以對話、交流、研討、會議、演講、會談、發表論著會談等各種形式推動包括陽明心學在內的儒學第三期發展工作。在他看來，儒學是「為己之學」、「身心性命之學」、「孝悌忠信之學」、「修齊治平之學」，只有落實到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儒家優質的倫理與教育資源，才能夠在現代化社會中，維持它的生命活力。

根據胡治洪、鄭文龍於2002年編的〈杜維明年譜簡編〉，杜氏以陽明心學為主題的專書著作、論文發表與學術會議活動，依時間序至少有下列14項：<sup>99</sup>

1.1968年，《尋求自我的實現：王陽明思想形成時期研究(1472-1509)》(英文)，向哈佛大學歷史與遠東語言博士學位委員會提交的學位論文。

<sup>96</sup>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儒學第三期：探索、自覺與創造性轉化(自序)〉頁10。

<sup>97</sup> 陳祖芬，《哈佛的證明》，頁38。

<sup>98</sup> 陳祖芬，《哈佛的證明》，頁38-39。

<sup>99</sup> 參見胡治洪、鄭文龍編，〈杜維明年譜簡編〉，頁716-722；鄭文龍、胡治洪編，〈杜維明論著編年目錄(1965-2001)〉(收於杜維明著，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5冊)，頁723-749。



2.1970年12月，〈從宋明儒學的觀點看「知行合一」〉（英文），刊於《哲學：理論與實踐——馬德拉斯<sup>100</sup>世界哲學國際會議文集》。

3.1972年6月，參加夏威夷「比較研究王陽明暨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周年學術討論會」，發表〈一個真實的人——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週年〉一文。

4.1973年3月，〈日本天理大學藏「王陽明講學答問並尺牘」卷初探〉，刊於《大陸雜誌》<sup>101</sup>第46卷第3期，頁28-35。

5.1973年8月，〈王陽明答周道通書五封〉，刊於《大陸雜誌》第47卷第2期，頁7-13。

6.1974年10月，〈王陽明四句教探究〉<sup>102</sup>（英文），刊於《東方佛學》<sup>103</sup>（Eastern Buddhist）1974年10月號。

7.1976年，《行動中的宋明儒家思想：王陽明的青年時代（1472-1509）》（英文），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

8.1976年，〈王陽明的青年時代：關於我的研究方法的個人反思〉（英文），刊於《明代研究》1976年第3期。

9.1981年1月，〈王陽明講學答問并尺牘〉，刊於《中國哲學》第5輯（長沙：岳麓書社出版）。

10.1982年2月，〈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意義〉，刊於《爭鳴》<sup>104</sup>1982年第2期。

11.1997年8月，赴日本出席「國際陽明學京都會議」，發表論文。<sup>105</sup>

12.2002年4月，〈主體性與本體論的實在性——王陽明思維模式的詮釋〉，刊於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4冊（武漢：武漢出版社出版），頁128-147。

---

<sup>100</sup> 馬德拉斯（Madras，即清奈），位於印度東南部的城市。

<sup>101</sup> 《大陸雜誌》，1950年創刊於臺北，是由社址設於臺北的大陸雜誌社出版的一份學術性月刊，乃全球漢學大家雲集地。

<sup>102</sup> 本文是杜維明應西谷啟治（1900-1990）和阿部正雄（1915-2006）兩位日本哲學家的邀請而撰寫。

<sup>103</sup> 胡治洪、鄭文龍所編〈杜維明論著編年目錄（1965-2001）〉，將《東方佛學》期刊，誤植為《東方佛者》。

<sup>104</sup> 《爭鳴》，是一份總部設於香港的政論刊物。

<sup>105</sup> 蔡仁厚，《蔡仁厚教授七十壽慶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頁112。





13.2002年4月，〈王陽明的四句教考〉，刊於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4冊，頁148-160。

14.2017年10月，《青年王陽明》，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共233頁）。

由上面這些資訊可知，杜維明多次闡述、發揮陽明心學於海內外，藉此媒介向美國、日本、兩岸三地、印度等地弘傳儒學，這對於儒學、陽明心學與世界各學術思想的對話、互動、溝通、交流等，無疑有著鉅大作用。

### （七）徵引陽明學派社會講學熱切之風鼓吹「傳道精神」

杜維明認為，如何把儒家的體驗精神，也就是孟子、陽明一路衍傳下來的心性之學，通過嚴謹的推理形式用當代的哲學方法和西方的學院術語表達出來，使得對中國文化生疏的歐美學術界樂於接受，未嘗不是一種宣揚儒學的權宜之計。<sup>106</sup>這過程，他特別表示亟需一批富有「傳道熱情」的「見證者」。他說：

我深深地感到儒家今天所最迫切需要的，實在是一批活生生的，氣昂昂的「見證者」——因為深入智慧的源泉而有活生生的風姿，因為內涵道德的大勇而有氣昂昂的胸襟。基督教所以能夠在凡俗化大盛的二十世紀開拓新的神學領域，……禪宗所以能夠在功利主義至上的社會裡開花結果，……固然由於很多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外在因素的交互影響，但是真正的動源仍是來自各精神傳承內部的見證者。<sup>107</sup>

這段論述，不但表達了杜氏對傳揚儒學的使命感，也扼要舉出足資參考的當代成功的宗教傳播範式。

緊接著，杜維明從明代中後期陽明學派人物身上找到這類植基於熱切的傳道（講學）精神之典範。他指出：「其實，明代陽明學派的地方講學和定期集會，尤其像王心齋和王龍溪等大儒以畢生精力在社會的基層裡作提攜後進的聖賢大業，就是這種（傳道）精神的具體表現。」

<sup>108</sup>此處杜氏所舉證的陽明及其弟子泰州王門王艮（1483—1540）<sup>109</sup>與浙中王門王畿（1498—1583）

<sup>106</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體驗邊緣的問題〉，頁10。

<sup>107</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體驗邊緣的問題〉，頁14—15。

<sup>108</sup> 杜維明，《人文心靈的震盪》，〈體驗邊緣的問題〉，頁15。

<sup>109</sup>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江蘇泰州人。本是一個灶丁，後追隨陽明，成為泰州王門領袖。著有《王心齋全集》。



<sup>110</sup>等人的講學典型夙昔，是契合史實的。

陽明從 34 歲開始授徒講學，先後從事教育與學術活動達 23 年之久。由於陽明身居高位，事功顯赫，所到之處，講學不輟，四方學子翕然追從。其門下後學包括了《明儒學案》所稱的浙中王門（浙江中部）、江右王門（江西一帶，含止修王門）、南中王門（蘇皖一帶）、楚中王門（湖北一帶）、北方王門（山東河南一帶）、粵閩王門（廣東福建一帶）、泰州王門（長江下游沿海一帶），以及《明儒學案》未提及的黔中王門<sup>111</sup>（貴州一帶）等分支流派。這樣就出現了陽明學派「半天下」的局面。

王艮於陽明生前卒後，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他主講席。例如，他曾於安徽廣德州復初書院、寧國府安定書院，江蘇泰州安定書院、南京新泉書院等主盟講座。<sup>112</sup>依據《王心齋全集》卷一〈年譜〉，王艮隨處講學、沿途聚講的主要經歷可摘要如下：正德 9 年（1514），在家鄉泰州講解《論語》、《孟子》，聞者悅服。學生中有官吏、士大夫、陶工、灶丁、樵夫、木匠、農民、傭人、商販、流寓、走卒等不勝其數。正德 16 年（1531），於南京國子監與監生論「六經」之旨。嘉靖元年（1522），自製蒲輪車，經山東北行京都講學，一路沿途聚講，時人為之側目，遠近喁喁向風。<sup>113</sup>

至於王畿，「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sup>114</sup>他認為「人不可以不知學，尤不可以不聞道，會所以講學明道。」<sup>115</sup>他主盟的講會至少有下列 26 會：浙江山陰沖元會、復陽會，撫州擬峴臺會，蘇州道山亭會，滁州滁陽會、南滁會，寧國府休寧會、宛陵會，婺源同志會、松原會，洪都同心會，新安進修會、福田會、山房會，

<sup>110</sup> 王畿，字汝中，號龍溪，浙江山陰人。舉嘉靖 11 年（1532）進士，歷官武選郎中。喜談說，能動人，林下講學 40 餘年。著有《王龍溪全集》、《王龍溪語錄》。

<sup>111</sup> 黔中王門，以孫應鳌為首，席書（1461—1527）、王杏、李渭（1513—1588）、陳尚象等人皆是其中佼佼者，他們是陽明及弟子在貴州培植起來的。其傳承脈絡可參見《王陽明全集》卷 33〈年譜一〉、卷 36〈年譜附錄一〉，以及明·許一德：《（萬曆）貴州通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年）卷 2 相關記載。

<sup>112</sup> 黃文樹，《陽明後學與明中晚期教育》（臺北：師大書苑，2003 年），頁 275-279。

<sup>113</sup> 明·王艮，《王心齋全集》（臺北：廣文書局，1979 年），卷 1〈年譜〉，頁 22-36。

<sup>114</sup>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12〈浙中王門學案二〉，頁 1。

<sup>115</sup> 明·王畿，《王龍溪全集》（臺北：華文書局，1970 年），卷 2〈約會同志疏〉，頁 218。



桐川桐川會，太平九龍會，白下留都會、憑虛閣會、蓬萊會，姑蘇竹堂會、萬松會，句曲華陽會，會稽龍南會、興浦庵會、完璞會、盟心會等。<sup>116</sup>可以說，王畿一生經歷皆在講會，反復諄切，感孚鼓舞。這種投身於社會講學的教育奉獻精神，令人肅然起敬。

## 六、杜氏的教育影響

近 50 年來，杜維明孜孜矻矻於海內外傳播儒家心性之學，已取得諸多效應。1997 年，方克立在《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表示：

(19) 80 年代以來，他（杜維明）頻繁地往來於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新加坡、美國、歐洲等地，應邀作學術講演，出席各種學術會議，積極宣傳新儒學的主張，影響範圍甚廣。現代新儒家在中國大陸絕響 30 年後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興趣，在很大程度上和杜維明的講學和宣傳活動是分不開的。<sup>117</sup>

與此相應，郭齊勇於 2002 年亦言：

他（杜維明）不僅艱苦卓絕地在北美「傳道、授業、解惑」，影響了眾多的西方學者與學生，而且風塵僕僕，席不暇暖，來往於北美、西歐、東亞、南亞之間，以仁心、學養、慧解、聽德與辯才，通過歷史研究及哲學分析，代表儒家與世界各大宗教、各大思想傳統及現代思潮諸流派交流對話，開拓了西方儒學的論說空間，並且返輸東亞和中土。<sup>118</sup>

同樣的，景海峰在 2002 年指出：

自 1981 年以來，杜維明一直在哈佛大學任教，1996 年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1999 年榮膺哈佛燕京中國歷史及哲學與儒家研究講座教授。多年來，他致力於儒家思想的現代闡釋工作和文明間對話溝通的事業，影響了大批的同行與學生、讀者與聽眾，集學術研究、人才培養、人文關懷、社會參與於一身，是當今世界最具有活力的儒家型

<sup>116</sup> 以上各會參見王畿《王龍溪全集》卷 1 至卷 7，卷 15 至卷 18 資料。

<sup>117</sup> 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頁 143。

<sup>118</sup> 郭齊勇，〈杜維明文集編序：讓儒學的活水流向世界〉（收於杜維明著，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 1 冊），頁 1。



的公眾知識分子之一。<sup>119</sup>

上面方氏、郭氏與景氏等人對於杜氏的近似見解，在中國大陸學術界已奠定了普遍性觀點。

2007年，劉述先在《儒學的復興》指出：在當代新儒學的發展過程中，狹義的當代新儒家由熊十力開山，第二代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加以發揚光大。「薪火相傳，還開啟了海外新儒家的線索，由杜維明廣佈於天下。」<sup>120</sup>他說：

（中國大陸）主持「現代新儒學」計畫的方克立<sup>121</sup>曾明言：「杜維明是海外和（中國）大陸推展新儒學最力的一個人」。其實這是不爭的事實，要不是通過（杜）維明的努力，新儒學哪有可能像今天這樣，由大陸到海外，成為眾所矚目的顯學。<sup>122</sup>

此應是契合史實的論斷。

杜維明對當代社會與教育的影響，扼要言之是：1970年代至今，他在臺灣、美國、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等地的大學任教、講學，加上1980年代下半葉起，他的著作大量在國內外出版、發行，對這些地域的文史哲學界、社會與教育文化等無疑有大的影響力——1991年10月杜氏「收到湖南鄉下一位才15歲的知青因讀《人性與自我修養》有所興發而寄來的問學書」<sup>123</sup>，便是其中一個具體實例。以中國大陸而言，1980年代中期，「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成為他們的「國家重點研究課題」之一（雖然仍帶有政治意圖）；而近30年來，當代新儒家的著作也在該地印行（儘管仍有所刪節），這對中國大陸學術界與教育界之影響，不容忽視。另外，筆者近日（2023年1月6日）在「華藝線上圖書館」用「所有欄位」搜尋結果顯示，以「杜維明」為檢索詞的「期刊文章」有312筆；「碩博士論文」有48筆；「會議研討論文」有21篇。另從「臺灣期刊文獻資訊網」加以搜尋，以「杜維明」為檢索詞的有29筆。最後就新加坡而言，1985年，杜維明受邀擔任新加坡政府提倡宣揚儒家倫理之學術顧問，決定在中學教

<sup>119</sup> 景海峰，〈三十年的畜艾——《杜維明文集》出版感言〉，頁232。

<sup>120</sup> 劉述先，〈《儒學的復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7年），〈牟宗三先生全集出版在今日的意義〉，頁106。

<sup>121</sup> 方克立（1938–2020），湖南湘潭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任教於南開大學哲學系，著有《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等。

<sup>122</sup> 劉述先，〈《儒學的復興》〉，〈現代儒學在英語世界〉，頁116。

<sup>123</sup> 杜維明，〈《人性與自我修養》〉，〈聯經中文版序〉，頁4。



「儒家倫理」課程，作為六、七個世界宗教課程的選項之一。在他的指導與協助之下，編寫了中學三、四年級的教材，討論了君子的模楷，仁義禮智的德目，《大學》、《中庸》的文獻，儒家的人性、自然、政治、歷史、藝術的觀點，以至內聖外王、天下大同的理想。<sup>124</sup>凡此足見，杜維明對當代學術與教育的影響，確實可觀。

## 七、結語

綜上可知，杜維明是第三代當代新儒家的健將，被譽為「儒家文化的布道者」、「海外推展新儒學最力的一人」。他自少年起即接觸陽明詩文，青年時期得力於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第二代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牖迪，漸入陽明心學之境。1968年，以《青年王陽明》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1981年起任哈佛大學教授，1988年成為美國人文、藝術及科學院院士，以發揚、傳佈儒學為畢生志業。

杜維明大量吸取陽明心學精華，在教學、講學與著作中充分應用陽明心學教育觀，揭示了七項珍貴觀點：其一是，以陽明人格典範期許現代知識人扮演「社會良心」。認為陽明的社會批判與抗議精神，正可以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借境。其二是，提倡陽明所體現的「士的自覺」與「體知」的工夫路徑。肯定透過道德的自覺與身心體證，是正確的為學之方及存養之道。其三是，從陽明「知行合一」之教推衍「習明納」教學法。確信身心合一的實習、踐履的教學歷程，細究、領悟經典義理，才能得其好處。其四是，援引陽明「實落用功」概念詮釋「修身」與「身教」之涵養。認為真切的修身與身教，是教育工作者的必要條件。其五是，取資陽明「良知說」以聲言「靈性培養」的重要性。評判現代教育過度傾斜於理工與科技，是偏頗的、不當的，教育當務之急宜為發掘人的「良知心」，培養靈性，以正視人文教育在培養人才上的關鍵作用。其六是，發揮陽明心學之益於海內外以弘傳儒家倫理價值。認為儒家的倫理，特別是陽明的心性之學，是現代社會極有用的精神資源。其七是，徵引陽明學派社會講學熱切之風鼓吹「傳道精神」。冀望有胸懷有大志的文教人士，接榘陽明學派人物「見證者」的熱情，於當今社會闡揚、實踐儒學優質精神與內涵。這些理念與作法，在當代高等教育殿堂放一異彩。

<sup>124</sup> 劉述先，《文化與哲學的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自序〉，頁10。





## 參考資料

### 一、傳統文獻（先按朝代先後，再依作者姓名筆畫順序由少至多排列）

宋·朱熹，1983，《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1992，《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王艮，1979，《王心齋全集》，臺北：廣文書局。

明·王畿，1970，《王龍溪全集》，臺北：華文書局。

明·許一德，1991，《（萬曆）貴州通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清·張廷玉，1971，《明史》，臺北：中華書局。

清·黃宗羲，1974，《明儒學案》，臺北：河洛圖書出版公司。

清·顧炎武著，周蘇平、陳國慶點注，1997，《日知錄》，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

### 二、近人論著（依作者姓名筆畫由少至多排序）

方世忠，2004，《儒家傳統與現代性：杜維明新儒學思想研究》，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

方克立，1997，《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方克立、鄭家棟主編，1995，《現代新儒家人物與著作》，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史炳軍、趙茂林，2001，〈唐君毅對陸王心學的繼承與超越——評唐君毅的心本論〉，《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3期，2001年9月，頁46-52。

牟宗三主講，蔡仁厚輯錄，1996，《人文講習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李彥儀，2009，〈牟宗三對王陽明「致良知」的理解與詮釋——以「致知疑難」為核心的討論〉，《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6期，2009年6月，頁171-196。

李瑞全，2010，〈唐、牟二先生之陽明學——兼論朱陸異同〉，《新亞學報》第28期，2010年6月，頁13-23。

李翔海，2010，《現代新儒學論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杜維明，2018，《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杜維明著，朱志方譯，2017，《青年王陽明》，北京：三聯書店。
- 杜維明，2016，《否極泰來：新軸心時代的儒家資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杜維明，2016，《文明對話中的儒家：21世紀訪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2014，《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杜維明，2014，《二十一世紀的儒學》，北京：中華書局。
- 杜維明，2013，《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和感悟（1966-197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杜維明，2013，《仁與修身：儒家思想論集》，北京：三聯書店。
- 杜維明，2012，《體知儒學：儒家當代價值的九次對話》，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杜維明、范曾，2010，《天與人：儒學走向世界的前瞻：杜維明、范曾對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杜維明、池田大作，2008，《對話的文明：池田大作與杜維明對談集》，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
- 杜維明著，彭國翔譯，2006，《儒家傳統與文明對話》，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 杜維明著，陳靜譯，2002，《我們的宗教：儒教》，臺北：麥田出版社。
- 杜維明著，郭齊勇、鄭文龍編，2002，《杜維明文集》，武漢：武漢出版社。
- 杜維明著，朱漢民、蕭永明編選，2001，《杜維明：文明的衝突與對話》，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
- 杜維明，2000，《道、學、政：論儒家知識分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杜維明，2000，《東亞價值與多元現代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杜維明著，鄭文龍編，1999，《杜維明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杜維明，1999，《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臺北：稻鄉出版社。
- 杜維明，1999，《十年機緣待儒學：東亞價值再評價》，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杜維明著，段德智譯，1999，《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杜維明，1997，《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臺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
- 杜維明主編，1997，《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新加坡 1988 年儒學群英會紀實》，臺北：正中書局。
- 杜維明著，岳華編，1992，《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杜維明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杜維明，1992，《人性與自我修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杜維明，1990，《儒家的自我意識的反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杜維明，1989，《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杜維明，1976，《人文心靈的震盪》，臺北：時報文化事業公司。
- 杜維明，1973，〈王陽明答周道通書五封〉，《大陸雜誌》第 47 卷第 2 期，1973 年 8 月，頁 7 - 13。
- 杜維明，1973，〈日本天理大學藏「王陽明講學答問并尺牘」卷初探〉，《大陸雜誌》第 46 卷第 3 期，1973 年 3 月，頁 28 - 35。
- 杜維明，1972，〈一個真實的人——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週年〉，《中國時報》1972 年 5 月 26 日，〈人間副刊〉，頁 8。
- 林安梧，2011，《牟宗三前後：當代新儒家哲學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林安梧，1998，《儒學革命論：後新儒家哲學的問題向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胡治洪，2004，《全球語境中的儒家論說：杜維明新儒學思想研究》，北京：三聯書店。
- 胡治洪、鄭文龍編，2002，〈杜維明年譜簡編〉，收於杜維明著，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 5 冊，武漢：武漢出版社，頁 716-722。
- 馬東玉，1997，〈當代新儒家人文教育評述〉，《遼東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 年第 4 期，1997 年 7 月，頁 67-70。
- 孫荻，2018，〈杜維明的教育理論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商情》2018 年 34 期，2018 年 10 月，頁 241-242。
-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東華書局。



- 張娜，2017，〈體知與審美教育〉，《阜陽師範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2017年6月，頁88-91。
- 陳祖芬，2010，《哈佛的證明》，北京：作家出版社。
- 郭齊勇，2002，〈杜維明文集編序：讓儒學的活水流向世界〉，收於杜維明著，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1冊，武漢：武漢出版社，頁1-8。
- 黃文樹，2021，〈徐復觀對陽明心學教育觀的理解與應用〉，《南臺人文社會學報》第25期，2021年11月，頁69-106。
- 黃文樹，2003，《陽明後學與明中晚期教育》，臺北：師大書苑。
- 景海峰，2013，〈三十年的奮艾——《杜維明文集》出版感言〉，收於杜維明著《龍鷹之旅：從哈佛回歸東海的認同和感悟（1966-1970）》，頁231-233。
- 鄭文龍、胡治洪編，2002，〈杜維明論著編年目錄（1965-2001）〉，收於杜維明著，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5冊，武漢：武漢出版社，頁723-749。
- 鄭家棟，1995，《當代新儒學論衡》，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
- 鄭家棟，1990，《現代新儒學概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蔡仁厚，1999，《蔡仁厚教授七十壽慶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劉宗賢、蔡德貴，2009，《陽明學與當代新儒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劉述先，2015，《理一分殊與全球地域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劉述先，2000，〈從中心到邊緣：當代新儒學的歷史處境與文化理想〉，《漢學研究通訊》總76期，2000年11月，頁555-563。
- 劉述先，2007，《儒學的復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
- 劉述先等，1997，《當代儒學發展之新契機》，臺北：文津出版社。
- 劉述先等，1994，《當代新儒家人物論》，臺北：文津出版社。
- 劉述先，1986，《文化與哲學的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劉雪飛、李建，2006，〈杜維明論「誠」與「成人」教育〉，《繼續教育研究》2006年第6期，2006年7月，頁107-108。
- 魏彩霞，2004，《全球化時代中的儒學創新：杜維明的現代新儒學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

韓強，1992，《現代新儒學心性理論評述》，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顧紅亮，2005，〈對德行之知的再闡釋——論杜維明的體知概念〉，《孔子研究》2005年第3期，  
2005年9月，頁105-111。





